

教育研究集刊

第六十二輯第三期 2016年9月 頁1-34

晚清甲午前使英人員教育見聞研究

周愚文

摘要



中國教育西化始於晚清，官方對主要對手英國教育的接觸，則遲至光緒朝初。本文旨在探討甲午前七位使英外交官對於英國教育的觀察，進而分析其認識程度及影響。主要史料為諸人日記或筆記，其範圍涵蓋中小學、大學、海軍學堂、女子學校、職業學校及師範學校，地區以英格蘭為主，另提及教育行政制度及學制。七人中有二人通曉英語，餘人參訪時需透過翻譯，以致產生理解差異。其所留紀錄，甲午前多已出版，數位後使英者曾看過前人之書。限於當時社會反洋的氛圍濃厚，以致諸人在英國的一手教育見聞，實難大量引介至國內，以帶動教育革新。以教育遷移理論觀之，此過程只能視為教育借入前的醞釀階段。

關鍵詞：外交官、英國教育、教育借入、晚清

周愚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t04035@ntnu.edu.tw

投稿日期：2016年03月26日；修改日期：2016年06月15日；採用日期：2016年08月17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eptember, 2016, Vol. 62 No. 3 pp. 1-34

A Study on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Diplomats in Britain Before 1894

Yu-Wen Chou

Abstract

The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was emerged since late Ch'ing; however the contact with the British education was not made until 1876.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nquire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of seven Chinese diplomats in Britain before 1894. Their diaries and notebooks were analyzed.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naval academy, girl's school, vocational school and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were introduced, and most of them were located in England. Only two diplomats knew English, so others needed translators' help when they made school visit; therefo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ame matter happened among them visited schools. Most records were published before 1894, and some were read by successive diplomats. Because the anti-westerners atmosphere was severe, it became difficult to introduce the diplomats' observation of the British education, not to mention any stimulation of the reform in Ch'ing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educational transfer theory, those experiences can only be understood as the brewing stage of educational borrowing.

Keywords: diplomats, British education, educational borrowing, late Ch'ing

Yu-Wen Cho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t04035@ntn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Mar. 26, 2016; Modified: June 15, 2016; Accepted: Aug. 17, 2016.

壹、前言

中國近代教育的西化，始於晚清。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鴉片戰敗簽訂《南京條約》後，西方列強開始入侵中國，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再敗清軍，影響不限政經及軍事層面，傳統教育制度與思想也漸受衝擊。同治元年（1862年）創設京師同文館，是清廷創設新式學堂之始。之後陸續增設語文學堂、軍事學堂及技術學堂等，這些措施都是配合當時自強運動風潮而來（徐宗林、周愚文，1997，頁166）。直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頒布《欽定學堂章程》，才正式建立西式學制。這40年間是一段摸索、模仿的過程。以往對如何仿日建立壬寅、癸卯兩學制的研究已多，但對西方國家的影響研究偏少。有鑑於此，本文將針對主要的英國做探討。

英國影響近代中國發展甚巨，但直到同治時期才有官方外交往來。同治五年（1866年）初，清派斌椿（1804-1871）率團訪歐，《乘槎筆記》記，4月至英曾訪「阿思佛」（Oxford），¹遊大書院數處（斌椿，2008，頁118）。隨行同文館翻譯德明（張德彝）的《航海述奇》載，訪英「文忒宮」（Windsor Castle）後，入一大禮拜堂及大書院，²皆百年前建造。內有男女學生300餘名，師生皆青色古衣（張德彝，2008a，頁523）。但至光緒二年（1876年）始首派郭嵩燾任駐英公使。後曾紀澤人等繼之，其使英期間，也留心英國教育，留有相關見聞的紀錄。此親身經驗是前人未有，作法近似比較教育學發展第一階段「旅人故事時期」（traveler's tales）³的方式（楊國賜，1975，頁1-2）。本文旨在探討清光緒甲午前使英郭嵩燾、劉錫鴻、張德彝、曾紀澤、鄒代鈞、薛福成及宋育仁等七人⁴（生平如表1），對於英國教育的觀察，進而分析其認識程度及影響，以助瞭

¹ 本文英地名、人名所附英文，係今編者或作者查考所加。

² 應為溫莎堡附近的St George's School，1352年創立男女合校之預備學校，非大學。

³ 此期特徵是，遊歷海外者透過觀察，常將遠方異國生活見聞，以遊記體裁向國內報導，但多數教育遊歷報告，均屬主觀感受與零散記載。

⁴ 同治七年（1868年）宜坻（1962年）奉旨隨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出訪西洋，撰《初使泰西記》，首任參贊黎庶昌（2008年）撰《西洋雜誌》，但查均無英教育記事。

4 教育研究集刊 第62輯第3期

解晚清對西方「教育借入」(educational borrowing)的情形。所用史料以七人的日記或筆記為主。

表1

光緒甲午前使英代表生平簡表

姓名	生卒	職務	使英時間	有關英國著作
郭嵩燾	1818-1891	首任公使	1876-1878	《使西紀程》、《倫敦與巴黎日記》
劉錫鴻	?-1891	首任副使	1876-1877	《英軺私記》
張德彝	1847-1918	使館翻譯	1876-1887	《航海述奇》、《再述奇》(《歐美環遊記》)、《使英雜記》、《四述奇》(《隨使英俄記》)
曾紀澤	1839-1890	第二任公使	1878-1885	《出使英法俄國日記》
鄒代鈞	1854-1908	第三任公使隨員	1885	《西征紀程》
薛福成	1838-1894	第四任公使	1889-1893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出使日記續刻》
宋育仁	1857-1931	第五任參贊	1894	《泰西各國采風記》

貳、英國教育見聞

本節將分按各類學校、教育行政制度及學制，依出使時序說明七人的見聞。

一、對中小學的見聞

七人中除鄒代鈞外，其餘均有相關記述，茲分述如後。

(一) 英殖民地的狀況

數人對英接觸的認識，始於港星殖民地。郭嵩燾於光緒二年10月初出使船途經香港時，應總督「鏗爾狄」(即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 1809-1883)之請，一同參觀五處學堂。所著《使西紀程》及《倫敦與巴黎日記》中均記，學館訓課凡400餘人，每堂可坐百人，由一教習主之。課中國《四書》、《五經》

及時文者三堂，中文教習主之；課洋文者一堂，洋教習主之，洋人子弟課《四書》、《五經》者一堂。堂分10列而空其前，每列設長案，容坐十餘人。學館皆國家經費。總督嫌其規模尚小，尚欲另立館擴大之。此皆各人讀書識字自贍身家之計，學習一、二年，粗能有得。又說英國學館通計，所教課者300餘萬人（郭嵩燾，2008，頁29-31）。又記學生皆貧人子弟，學習二、三年，粗能有得，往往自出謀生（郭嵩燾，2008，頁33）。而同行副使劉錫鴻（2008，頁52）《英軺私記》亦載，經港時由總教習、副教習導觀學堂，學堂構三層閣，其下初學居之。學既進，則以次而升於上。所習有中、英文。學規嚴整，客至無偶語嘻笑者。另翻譯張德彝《隨使英俄記》載隨行訪港學院，更細記樓高三層，學生500餘人，其中華人四百數十餘名，西人數十名。學分五堂，華人課華文者三，西人課西文者一，西人課華文者一。每堂百名，一師主之。堂分10列而空其前，每橫長案坐十餘人，以次向後，層累而高。前則師正坐相對。學規整肅，學生安靜（張德彝，2008b，頁282）。按他們所參觀的學館應是創立於1862年的中央書院（The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

又張德彝《隨使英俄記》記使英途中，光緒二年11月底至「莫洛塔」（Malta），島間大書院二，小學館34（張德彝，2008b，頁301）。

光緒五年（1879年）正月歸國途中，郭嵩燾再詢同船的香港學館總辦「史安」（疑是「史釗域」，Frederick Stewart, 1836-1889）學館情形，他答所管學館為大學館，學生500餘人。另有小學館30所，皆出自國家費，小學館以三、四（疑漏百）人為率，並教習漢文。大學館則參以洋文，而仍以習漢文藝為主。近研議開課洋文，已規劃一，但未實行。郭向索學館章程，但答成立十餘年未具（郭嵩燾，2008，頁906）。2月到港時，又至學館一遊（郭嵩燾，2008，頁964）。另過新加坡時記，立學館19，大者二，每學館三、四百人，小者17。洋文三，專課西人，本地學館二，中國學館12（郭嵩燾，2008，頁953）。以上所稱大學館係中學。

（二）英倫三島的狀況

1. 郭嵩燾

郭嵩燾使英期間曾參觀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多所中小學，茲分述如後。他到英不久，光緒三年（1877年）2月初，即參訪倫敦「客萊斯阿士布達洛學館」

6 教育研究集刊 第62輯第3期

(Christ's Hospital)，觀其晚餐；記小學生700人，分16桌。該校已設350年，衣服禮制相傳未改。招收年15以下者，大率是家貧無資、孤苦。每日供三餐及衣服。所學分為天文、數學、兵法。年15以上者，送入大學館，但衣食仍由學館資給(郭嵩燾，2008，頁132-133)。4月訪「京斯葛里叱醫學館」(King's Cross Hospital Schools)，分堂教習共30所，約千數百人(郭嵩燾，2008，頁210)。6月訪友經七橡樹(Sevenoaks)，順便參訪一小學館，男女學生環立相迎(郭嵩燾，2008，頁259)。光緒四年正月訪倫敦「京斯克羅斯」(King's Cross)附近「河滿安得克婁尼亞爾」(Home and Colonial Infant School Society)的學館，分六堂，約千人，小兒三、四歲以下一堂200人；專習教讀之法必充館師一堂亦200人(郭嵩燾，2008，頁390)。光緒三年12月應前「河滿安得科羅尼亞爾蘇塞也斯古洛」學校教師得寧之邀往訪，學校總辦及幫辦陪遊各學堂。記：4歲、7歲、10歲及15歲以下各一堂，皆婦人教之。而友人「得寧」與「科格蘭」分教婦女之授讀為童子師者。婦女入學五年，粗有成，可以授讀，則就此學館課以授讀之方。兩年學成，國家遣人考試之，取中者記其名。乃令入小學館授讀，試其能否，然後給以文憑，聽人延請課讀。共有三歲以上童子1,100人，婦女學習課讀者200餘人。後者是女子師範學校。他並詳記各學堂規矩及上課情形，四歲以下一堂約50人，授字母者30人，教手法者20人；七、八歲以下一堂200人，教生物及手工；十一、二歲以下一堂約五、六十人，教之算數；十四、五歲以下一堂約20餘人，教以寒暑表之用；其十五、六歲女子習針黹者二、三百人，數女師教之；其習授讀者，則皆十八、九歲女子。該校創立已42年，國家每年有補助，歲用有7,000鎊，其教法專取於「博斯多洛機」(Pestalozzi)，專誘童子耳目，使之聰明(郭嵩燾，2008，頁435-436)。他稱讚：「西洋成就人才，使之為童子時嬉戲玩弄一以禮法，又群萃而歌起之，以不至生其厭教之心」(郭嵩燾，2008，頁436-437)。同月底訪「白名登」(Birmingham)，記人口40萬，入學讀書者3萬餘人。友人引訪「盤爾得」「斯古洛」(school)，學生自三歲起至十四、五歲，共1,200餘人。識字、習教，皆婦女教之。女生至五、六百人。其大學生一堂，年十一、二以上，四、五百人，習拉丁及希臘文與勾股算學及地理相間，而日常一習歌。該校分男女兩館，總教習一人，分教八人。六、七歲以下，婦女教之，亦總教習一人，分教八人。另有學館十餘處，規制與該校大略

相同（郭嵩燾，2008，頁441-442）。又記當地學館最久者，是「興愛覺爾得」（King Edward's School），國王捐費歲收1.6萬鎊，令來學者不出學費。200年來，以其贏餘增至學館五所。近亦擬改舊章，力有餘者，仍出學費。俟學生藝有專精，送入「阿斯弗」（Oxford）學館（郭嵩燾，2008，頁442）。他又記英國之法，三、四歲以上皆入學。子弟不入學，坐罪家長。貧家習工業、充役，約以12歲為斷；仍聽半日就工役，半日入學。至16歲，乃聽出學。凡城鎮房屋，各估其收入，租價月至100鎊以上者皆捐學費，為常用之資。其年16以上讀書有成者，乃入大學（郭嵩燾，2008，頁442）。光緒四年正月記倫敦有小童私塾1,540家（郭嵩燾，2008，頁468）。10月記「類登」（Yeadon）、「比爾」、「脫林」（近「溫則」行宮，Winsor）均有大學館，世爵大族子弟均就此三處讀書，俟有成，分入牛津、劍橋上學館（郭嵩燾，2008，頁781）。

至於蘇格蘭的狀況，光緒四年9月他訪「愛登白里」（Edinburg）遊兩所學館，一是「覺爾治赫爾諾得何士畢得爾」（George Harold Hospital），該校是依英王「占摩斯」（James）之冶金工「赫爾諾得」遺囑1624年在其家所建，專收本地貧童。蘇格蘭此類學館甚多。該學館共收養童稚210人，設教習10人，5人居館中，5人日一至講授。5-14歲，以年為限，而在學久暫不論。過14歲，試得優等，再留兩年，則送入愛登白里大學，而仍資給其膏火，歲以10人為率。課程有算學、拉丁、希臘文及英、法文。又以其經費分設19學館（郭嵩燾，2008，頁756-758）。按以上郭嵩燾所稱大學館當是中學。

2. 劉錫鴻與張德彝

劉錫鴻《英軺私記》光緒三年2月記，「赫來士呵斯必鐸」（Horace Hospital）者（位倫敦），大學館。建自350年前，規模特大。學徒10-20歲，凡700人，衣食皆取給於館。25人為一所，膳寢相偕，領以同學年長者。費由公捐。15歲後，見可造，則升入「岳斯笏」（Oxford）大書院，衣食仍由館提供。每週四晚，集學生奏樂，誦聖經（劉錫鴻，2008，頁106）。又訪「利文浦」（Liverpool），詢問鄉義塾狀況，記此地向少義塾，今增至10所。義塾多則賊少，因學塾皆工商之事，人各就工商則不為盜，故教規特嚴。凡童子5-13歲，皆令入塾。曠學則其師督催之，至二至三仍不改，則治以官法（劉錫鴻，2008，頁160）。另記訪英人「阿木士湯」（Armstrong），導觀其在「牛克索」

8 教育研究集刊 第62輯第3期

(Newcastle) 所建義塾，堂室數十楹。學生男女共1,200人，每百數十人延一師，女子傳以女師，幼孩亦女師。四、五歲者教唱聖經。稍長，習書算。又長，授以勾股開方之法。其師一一面試，鮮不嫻。每年經費，約金錢6萬，「阿木士湯」獨供之（劉錫鴻，2008，頁174）。又記，西人不重後嗣，積產數千萬，臨終盡捨以建義塾及養老濟貧等院（劉錫鴻，2008，頁175）。復記，去「北明根」（Birmingham）途中，經「爾羅姑畢」，有學塾，為大家子弟習藝之所。英人子弟就學，貧富各異處，慮惡習相染（劉錫鴻，2008，頁193）。再記，遊愛爾蘭學塾及書院。又記或設巨舟為塾，教練航海各工（劉錫鴻，2008，頁207-208）。

張德彝《隨使英俄記》記，光緒三年3月底「司悌義」邀看「德露芝」學堂。七年前建，學生560人，分四等，頭等15歲以下，二等13歲以下，三等11歲以下，四等6歲以下。所學為文字、化學、格物、測算、畫工、力學等課程。到訪日正值學生演力之期（體育競賽）（張德彝，2008b，頁394）。4月中應邀赴「萬泗堤」村孤獨子女學堂看視獎賞。堂內孤獨子女由三、四歲至十一、二歲601人。院內有學堂、琴房、化學房、臥房、飯廳、沐浴室、玩藝室，共五層樓，房千間（張德彝，2008b，頁416-417）。6月隨友人看育嬰學堂（張德彝，2008b，頁431）。8月中記，友人告訴倫敦東北「伊埔隋芝」（Ipswich）村的義塾，昔有六七，今增至12。義塾，是補官學之不足。凡男女5-13歲，皆令入塾，有嚴師以督課之（張德彝，2008b，頁455）。光緒四年2月中記：

英人教養子女，紳富或自延師，或公建學堂。都鎮鄉村，各有義塾，自數所以至數十所，其西席自數人以至十數人，均按其地之大小而酌行之。經費有公捐、有獨捐，亦視其地之有無巨富為斷。貧而無力就學者，皆收此受教，供其衣食，不聽他出。男有男師，女有女師。一切循規蹈矩，法律嚴明。凡生子女皆報官。鄉官歲核戶冊，已屆五歲者令入塾，……。（張德彝，2008b，頁539）

2月底又記：「英國幼童入義塾而不安靜者，皆改入巨舟。舟亦善人施捨，在上仍行訓課，兼練航海各工。跳越爬登，各如所願。是其隨性用人，不欲一人

失學，無所成就」（張德彝，2008b，頁541）。3月中記，按英規，凡幼童子女已屆五歲者，官即令其入塾習讀。初學教以語言文字。年逾10歲，教以算術勾股開方之法，此為小學。年至15，其愚魯不能深造者，即令就工謀食；其資稟特優者，令他學天文、地理、化學、光學、格致、醫學，以及機器、畫工等藝，此為大學（張德彝，2008b，頁545）。9月中又記：

英人……。為子女廣設學校，給以衣食，教以文字各藝。言語有時，步履有方，規矩及其嚴肅。有築樓閣，儲冊籍，遍揭圖畫者。有羅陳動植諸物狀、珍異諸名色者。有聚萬牲而蓄之，匯眾芳而詩之以為園囿者。有輦木材藥料，區其名目，別其功用而爛列於廳堂者。有構館舍，聘名師，主講光化電氣各學者。遠近棋布星羅，縱男女士庶觀覽摩效，以為學識之助。其各種機器亦薈萃一區，運用演試，使人得審視之。（張德彝，2008b，頁610）

3. 曾紀澤、薛福成與宋育仁

曾紀澤於光緒五年（1879年）繼任英公使，《出使英法俄國日記》載，初到3月隨翻譯至倫敦「耶穌廟學館」（疑是Christ's Hospital）中，觀幼童晚餐。幼童800人倚食案排列立迎。該校設立已300餘年，館中學生有文事武功得令名者，則鑄銅像以肖之。所習之業，希臘文詩、歷代史策、水師軍制，另有軍旅之樂，文事武功並重（曾紀澤，2008，頁185-186）。光緒十一年4月至家附近「依士本書院」（Eastbourne College）頒學生獎賞（曾紀澤，2008，頁822）。6月至「依士本老城書院」頒學生獎賞（曾紀澤，2008，頁836）。此外，光緒五年3月讓其子曾廣銓至城外塾中從女師稍學英文（曾紀澤，2008，頁204）。此一經驗為他人所無。

第四任公使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光緒十八年（1892年）7月中記，訪「六汀騰」（Luddington）途中，經一貧孩院（孤兒院），院中男女孩凡300餘人。有廚房、書庫、浴室、飯廳、讀書堂、男女孩臥室（薛福成，2008，頁611）。11月中記，西國書院之法，以美最優，千人中在塾者197人，而英則為143人（薛福成，2008，頁685）。光緒十九年（1893年）4月記，英倫敦有「赫

來士呵斯必鐸」大學館，建自350年前，學徒700人。有可造者，升至「岳斯笏」大書院（薛福成，2008，頁775）。

第五任參贊宋育仁《泰西各國采風記》，詳述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教育，兩地共分52部，稱「康退」（County）或「射爾」（Shire），之下所屬鎮邑稱「爬雷司」（Parish），共11,090個，皆有學堂。大者多至七、八所，小者至少必有一、二所，除富家世爵自建學堂不計，凡官學教平民5-17歲入小學，每一小學分為五等，每等各一師，分屋而教。初入教以學字音、書字母、習歌聲、記數目。教者立學者坐，木几木櫈皆附著於地，前後次比。教者讀26字母，幼子同聲和誦，音必齊，教歌如之。粉書字母於版，幼子摩寫如式。分教習課之業爛，進一等，學拼字法、辨音律八韻，此為孺館課。三年皆通，年10歲外，進一等，肄書習筆算、審地圖、知五洲各國山川方域大略、識地球日月各行星軌道，此為蒙館。總教習考察皆通，年十四、五，進一等，學羅馬希臘文、各國今文、史記、習函札、繪地圖、作論，其尤穎者，兼及算格諸學，此為經館。五等皆小學次第，或并於一院，一總教習董之，視學舍生徒多寡，定分教習人數。下舍課熟，轉於上舍。或孺館、蒙館、經館各為一院，或孺館附於蒙館。10歲以下教習皆女師。院有廣庭，後園為之秋千、蹴鞠、舞干、琴棋，每日課畢，教習率而以戲。10歲以外，每日入學出學，皆按步伍。課畢，教以拳技坐作進退。蒙館別舍，聚竹頭木屑、舊廢銅鐵器皿，斧金刀錯畢齊，有工師教導，令生徒能以廢財，改製成器者。材出於公，器歸於己。閭閻子弟志為工商者入蒙館，為士者始入經館，再由小學而入大學（宋育仁，1964，頁15）。又記英國50年前尚無官設鄉學，於民所設者發帑獎勵，繼而改為官設，併入度支（宋育仁，1964，頁16）。又記，英民皆入小學，17歲畢業，秀者入經館，不願充兵；樵者略涉小學，不能通，改執他業（宋育仁，1964，頁14）。復記30年前定制，令男女12歲以上皆入學堂，貧者公家出財，不送入學有罰。小學考成以後，可習專門學業（宋育仁，1964，頁21）。宋育仁當是首位詳述地方教育制度及其學校內部狀況者。

二、對大學的見聞

七人中除薛福成外，其餘均有相關記述，茲分述如後。

（一）郭嵩燾

郭嵩燾在英時曾拜訪英格蘭及蘇格蘭多所大學，有關英格蘭的情形，光緒三年3月參觀倫敦的四大法學院，記「林賡新」（Lincoln's Inn）學生700人，時伍廷芳（1842-1922）在此學律，「中堂」（Middle Temple）及「內堂」（Inner Temple），各三、四百人及「格雷斯」（Gray's Inn）（郭嵩燾，2008，頁176-177）。5月日本友人來見，言就讀「阿思弗」（Oxford）小學館，共有28處，大學館約2,000人，其餘200餘人。各館所學習內容有律法、天文、地理、博物、化學、算學、史學（郭嵩燾，2008，頁235）。10月中應「阿斯甫學館紐科里治」（New College, Oxford）李格（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邀約往訪問，並記英有兩大書院，一在「阿斯福」（Oxford），一在「刊比里治」（Cambridge）。劍橋尚實學，牛津尚古學（郭嵩燾，2008，頁370）。24日更詳載英國大學制度。他指出大學館以「阿斯福」及「堪百里治」最勝。「阿斯福」有學館（稱「科里治」，college）21個，而「由尼法西諦」（university）負責考試，建立最久已千年。詳列20個學院的名稱及住宿生人數（如表2）。然後介紹住宿情況及導師制。「每住館生各一住房，一讀書房，二房相聯，極精潔，所學天文、地理、數學、律法及諸格致之學，皆擇其所藝已成者試之乃得入。各以類設師程督之，率十許人從一師。」行政上，每學館設一學正（稱尚書，即院長），多牧師主之；另總設一尚書稱「占西洛爾」（chancellor，即校監），另有副尚書一名，稱「歪斯占西洛爾」（vice chancellor，即校長），兩職務均每年更換。訪問時，曾參訪「馬克得林」（Magdalen）、「阿勒蘇爾士」（All Souls）及「克萊斯覺爾治」（Christ Church）三學院。又遊「波里安大學堂」（Bodleian library）（郭嵩燾，2008，頁376-378）。到訪時正值大學辦理學位考試，往觀後記：

次則各學館教師領就試學生，多或四五人，少或一人，排立「歪斯占西洛爾」前，曲躬數就試名，數約四十餘人。退而歷口試、筆試二處，別有監試者。其口試則監試三人與就試一人對坐，問以古事。……筆試則監試一人高坐，試者四十餘人，各以一小案西向坐，隨所藝試之。

（郭嵩燾，2008，頁379）

表2

牛津大學十九世紀後期各學院一覽

學院	原名	住宿生數
由尼法希諦	University	109
巴里爾	Balliol	196
彌敦	Merton	76
林根	Lincoln	66
珥克斯得	Exeter	172
阿里爾	Oriel	83
魁英斯	Queen's	100
紐科里治	New College	130
阿勒蘇爾士	All Souls	5
馬克林得	Magdalen	101
巴里斯羅斯	Brasenose	131
科爾博斯克立斯諦	Corpus Christ	60
克來斯覺爾治	Christ Church	154
得林意諦	Trinity	96
森約翰	St. John's	110
基色斯	Jesus	57
哇單	Wadham	52
百爾倫白洛克	Pembroke	84
烏爾斯得	Worcester	98
吉百里	Keble	142
哈爾得弗爾得	Hertford	69

又介紹考試分「博秩洛爾」（猶秀才，bachelor）、「瑪斯達」（猶舉人，master）及「多克多爾」（猶翰林，doctor）三試。歲一試，而試者各以年限，必經三年才得試翰林。而翰林亦重前三名，依次稱「西尼爾朗克勒」（senior honour）、「色根得朗克勒」（second honour）、「色爾得朗克勒」（third honour），統稱「得來波斯」（tripos）。三試須牛津學館生，外人不得參與。學館「占西洛爾」亦歲派人週蒞各處學館，試學藝高下而記錄之。其經遭試錄取，亦與「阿斯福」學館一例歷試。所給執照僅虛名，並不報告國家。各試通

過者歲給獎金百鎊。其試至翰林，得留校充當教士，稱「卜魯」（fellow），稱「卜魯非色」（professor）。又載學館稱「科爾治」（college），總學館主試稱「由尼法希諦」（university），屬倫敦者三所，「阿斯福」、「刊百里治」及「得蘭莫」（Durham）。近年倫敦也設「由尼法希諦」學堂，凡各學館藝生皆得試。屬蘇格蘭者有四所，「愛敦白拉」（Edinburg）、「阿白爾定」（Aberdeen）、「拉斯噶」（Glasgow）、生「安德魯」（St. Andrew）；屬愛爾蘭者一所，「得布倫」（Dublin）（郭嵩燾，2008，頁379-380）。

至於蘇格蘭的情況，光緒四年9月訪郭嵩燾歸國前先遊「愛登白拉」（Edinburg），訪「由理法斯諦學館」（university），記館生有2,400人，分48堂，教習37人，以兼充者多；其餘小教習，每堂二、三人不等。學生皆各以時至學堂聽講，當時值放假故無學生，另遊學館、博物館（郭嵩燾，2008，頁756-758）。又載「愛登白里」大學院「詹摩斯第六」（James VI, 1566-1625）1582年建，「森丹得魯」（St. Andrew）1412年建，「阿伯定」（Aberdeen）1494年建，「格喇斯噶」（Glasgow）1443年「占摩斯第二」（James II, 1633-1701）建，早於愛丁堡（郭嵩燾，2008，頁762）。之後訪「格喇斯噶猶尼法斯諦」（Glasgow University），該校新建的學院不及八年，歲費120萬鎊，其中國家補助12萬鎊，民捐20萬鎊，「愛爾登」船廠捐500萬鎊，其餘皆學館存款為之。集學生2,000人，教師70人，以醫學、化學尤勝。另參觀博物館、電氣學館（郭嵩燾，2008，頁769）。但郭嵩燾不知蘇英兩地大學體制不同，蘇制近歐陸。

（二）劉錫鴻與張德彝

劉錫鴻（2008，頁207-208）只記，大學之處，「刊卜吏治」（Cambridge）10書院，以光、化、電學為主；「岳斯笏」30餘書院，以各國語言文字為主。

張德彝書載，光緒三年3月中英人邀赴「海伍立」街學堂晚茶，後入其學堂。又至倫敦法庭聽審案，順道參觀「林昆斯音」、「米得爾坦布」、「印那爾坦布」、「闊島奎印斯班斥」（即前指四大法學院）。入律書閣（圖書館），至律書四萬冊，繫天下各國及本國者，學律人日詣而習之（張德彝，2008b，頁381-383）。光緒三年11月初代公使出席「金泗學塾」（King's College London）茶會。學生30餘名，得獎者15名（張德彝，2008b，頁511）。4年3月中記，英大學院有二，「堪卜立址」（Cambridge）及「敖克斯佛」（Oxford）。前者，以

光化各學為主，後者以各國語言文字為主。通國大小文武官員，其出身必由此二學（張德彝，2008b，頁545-546）。光緒四年9月又記，英國大學，通國以英格蘭之「敖克斯佛」及「堪卜立址」的二大學院為首，二處之學堂亦最為多，官員亦多。如牛津大學，由大學士總理監督至提調助教等，共52人。又考試官26員、監試官13員、察學官6員、教習84員。學堂37所。至於劍橋，官員教習數與牛津大同小異，學堂17所；並詳列兩大學課程。而倫敦大學院，大小官員40人、考試官46員、監試官12員、教習43員。學堂四處：「克英斯」（King's College）、「立特呢」、「德爾杭」、「西敏斯德」（Westminster）（張德彝，2008b，頁605-606）。又《使英雜記》載，凡人造一書，必送倫敦博物館（按大英博物館）、「敖克斯佛」與「堪卜立址」二大學院各一本，以為存稿（張德彝，1962，頁9188）。

（三）曾紀澤、鄒代鈞與宋育仁

曾紀澤於光緒五年閏3月至倫敦大學院「輿地會」（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聽遊歷中國川滇黔講演（曾紀澤，2008，頁201）。歸國前，光緒十二年2月偕夫人遊醫學院，極久（曾紀澤，2008，頁898）；4月遊愛丁堡醫學院（曾紀澤，2008，頁918）；5月遊「李子書院」（Leeds College），觀織學房、染學房、機器房三處（曾紀澤，2008，頁929）。

第三任公使隨員鄒代鈞《西征紀程》記，有大書院三，每院之長凡數百人。以為有專門，所學不一，非多置院長不能教授。取士非一途，無定額、無定時，凡民之學成，即言所學於大書院，院長據所學而試，果成則給執照（鄒代鈞，1962，頁9603）。

宋育仁（1964，頁15-16）書記，大學總者為太學，分者為書院，課程相等分學而治，太學下有道學（神學）、法學、醫學、藝學等院；書院之分名為館，有營造、冶礦、機器、精藝等館，或並附於書院，畫舍而居，或別為一所，與經館並立。生徒年20，經館課業皆通拔入書院。太學舊式入大學者，率以經館為階重古學，近日增實學館重格算等學，皆有成效，一體拔入。太學書院課程以四年為期，分五類：羅馬希臘古文、本國今文英法德文字，二列國史乘輿地圖說，測算天文地理，格物化質兼及物性種植，性理公法富國策。書院課程期滿，由太學考試，入選給以文憑。諸生入太學深造，其課如前五類外，分道、法、醫、藝為

四大科，習四科者恆以書院所素學者為本，學成課最獎，給文憑如舉貢。道科者為道師、法科者為律師、醫科者為醫師、藝科者為製造師。又記太學英格倫三、蘇格蘭四、阿爾蘭二，共九區。又記英人仕進之路有五，學校是其一。由法學院考成，為律師；由藝學院考成，為藝師；由文學院（統格致等五科）考成者，不必入仕途；才能尤異，由「阿佳底密」大學院眾學士得舉為學士。其入仕者，由學部總管府（樞密院）舉為典試官及太學大書院教習，或於學業外，兼有治事才，首相得舉為學部正副長官。博士地望高，不在意學部大臣，故多不仕；由道學院（神學院）考成者為教士（宋育仁，1964，頁1-2）。

三、對其他類學校的見聞

（一）海軍學堂

郭嵩燾（2008，頁40-41）於光緒二年十月底過星時曾訪其學堂，觀所訓練船政學堂學生20人；11月中途中翻譯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 1833-1906）說明，西洋各國有商部大臣，有船政學館。學既成，由商部試之，得高等者令充船長，其次分司各執事（郭嵩燾，2008，頁54-55）。光緒四年正月至「格林里治海軍學館」（Greenwich Royal Navy College），嚴復（1854-1921）等六位閩廠學生來見，他詢問讀書章程，學生告知每週上課情形。各堂教師皆精一藝，質問指授。諸所習者並歸宿練習水師兵法（郭嵩燾，2008，頁449-450）。4月率員訪該學館，記學館分四區，有學堂、畫像及飯堂、教堂、妙西因（Museum）。其地故為王宮，1871年改為教習水師學館，歲費國用2.5萬餘鎊。所歷學堂僅數學、砲臺、機器、格致四處。另有義大里及德國語言文字學堂（郭嵩燾，2008，頁586-587）。張德彝則記，受水師學堂學生嚴復等人邀請，陪公使往訪「格林泥芝」（Greenwich）村水師學堂訪問，先看學生寓所，再看學堂，見所用測量度數、里數各具，皆與行船所用者同（張德彝，2008b，頁560-561）。

宋育仁（1964，頁13）記，陸軍各級軍官皆選於武備學堂，水師則選於水師學堂。又記「格林尼址」（Greenwich）水師學堂，自都司以下皆許入學肄業。先考進門試，課以算術、器機、水火重熱、天文海線諸學，及格者或與住院，或就院居，或日至皆聽。試及某等者有獎，課膏廩循序進業（宋育仁，1964，頁17）。

（二）女子學校

郭嵩燾於光緒四年9月參觀愛丁堡「類里斯科里治」（Ladies' College），記該校：收7-18歲女子1,200人，為「莫爾森昧登何士畢得爾」（Hospital）之三校之一，為堂40，男女教習60人，大抵教數字及諸淺學，女人為之；算學及製造機器，則宿儒專門之學為之（郭嵩燾，2008，頁762）。月底訪「格拉斯哥」「赫頓生斯古諾女學館」，8歲以下入學二年者為一堂；10歲上下入學四、五年為一堂；十二、三歲習算，課以加減乘除之法為一堂；十四、五歲學畫、學針黹為一堂。其課針黹及12歲以下，女師為之。其餘皆老年宿學。另有武員一人，專教步武踏歌。有女學生850人，皆本市人。另有男校1,200人，但未及訪（郭嵩燾，2008，頁771）。劉錫鴻（2008，頁199）記，女學塾有教畫繪、縫織、烹調諸事。曾紀澤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5月中，至倫敦「依維師立」女書塾發獎賞（曾紀澤，2008，頁838）。宋育仁（1964，頁15）記學堂女學10歲以前與男同，以後以吹彈歌曲繪畫為主。

（三）職業學校

郭嵩燾於光緒三年3月友人介紹「斯古落阿甫買英斯」（school of mines）（郭嵩燾，2008，頁174）。光緒四年10月初記商人「李德」子肄業礦業，出示「羅亞爾斯古洛阿甫買英斯」（Royal School of Mines）及「羅亞爾科里治阿甫鏗密斯德」（Royal College of Chemistry）兩處考試文憑七紙，於礦學、化學、機器皆經歷試（郭嵩燾，2008，頁781）。張德彝於光緒三年2月底陪英友人遊格致書院（「普立提克呢克音司的究慎」，Polytechnics Institute）。再陪二使遊集經書院（「洛亞音司的究慎」，Royal Institute）（張德彝，2008b，頁373）。曾紀澤於光緒六年4月率員至格致書院，觀映光戲劇、水輪機、空氣壓力機暨其他戲（曾紀澤，2008，頁327-328）。

（四）師範學校

除前述郭嵩燾在倫敦所見女子師範學校外，宋育仁（1964，頁16）也記，師道館，培養蒙館之師，其課程為英、德、法三國今文、代數幾何勾股算法、金石動植格物化學、地球圖說、各國史記、律呂、敬神修身之道。除溫理諸學，每日練習教授之方，為女師者，但減所業。課程既滿，給與文憑，始就聘蒙館，鄉學教習皆取於此。經館書院教習取於太學。太學教習取於進士或博士，經館以下由

民舉，書院以上由官舉。

四、有關教育行政制度的見聞

郭嵩燾（2008，頁395）記，光緒三年11月拜見總管學校尚書「三敦」（即「山頓」，Dudley Francis Stuart Ryder, Viscount Sandon,⁵ 1831-1900）。光緒四年2月拜訪學部尚書山頓，問學部章程，獲贈《議院增議學館章程》及《年報》二書。山頓並說，英國官學、民學，一統之官，歲常一查其功課。其學師及考試入第等，國家皆廩餼之，計歲常費300餘萬鎊，其長亦稱尚書。地方學校設立「科密底」（committee）總師其事，稱「斯古洛波爾克」（school board）。40年前國家未嘗過問學校，當見各國人才輩出，恐英漸不能及，始議經理學校，增修考課之法。其議發自「威廉第四」（King William IV, 1765-1837）時，至今君主即位始舉行。近10年更訂章程：人民未及10歲不得習試技藝，無貧富皆納之學中。逾10歲習工事，須由學試期能通文字及開方算學、給之文憑，非是不得習工事。國家皆歲時派人稽查。不過牛津、劍橋兩大學得遣人考試各學館高等者，錄入大學院，歲一試之，給以名號，三試乃成，歲有廩餼。皆自為政，國家不能經理（郭嵩燾，2008，頁517）。山頓之言，概述了英中央及地方教育行政新制。薛福成（2008，頁597）於光緒十八年閏6月記國會改選，「阿克蘭」（Arthur H. Dyke Acland, 1809-1898）任上議院副首領兼學部尚書。宋育仁（1964，頁7）記，文學院優異之士，首相得舉為學部正副長官，由總管府（樞密院）大臣兼其貳為副總管，稱尚書（宋育仁，1964，頁2）。地方官有五種，學校官是其一，由民舉。又記，太學官建者入度支，學部主之（宋育仁，1964，頁16）。

五、有關學制的見聞

張德彝書光緒四年九月初記英國學制的狀況：英官學義塾共分三類，大學院、學堂及書塾。凡男女幼童初學入書塾，繼入學堂，肄業有成則入大學院。考中後，則說某大學院出身，頗為人所敬重（張德彝，2008b，頁605）。這是首次介紹英國學制。又錄全國有大學院29所、學堂大小517所、書塾18,745所，共計

⁵ 1874-1878年間任樞密院教育小組副主席及教育署署長（周恩文，2008，頁305）。

19,291所(頁606)。宋育仁(1964,頁15)則記小學分孺館、蒙館、經館,5-17歲;之上為大學分太學與書院。

參、綜合分析

以下分三方面進一步分析七人的見聞。

一、認識到什麼

首先,就教育事務紀錄分量與重視程度而言,七人中首推郭嵩燾,宋育仁次之,張德彝再次,其餘諸書都甚略。郭氏出發時途經港、星就參觀學校,到英後不久就去看小學。另返國前,還北遊蘇格蘭訪愛丁堡及格拉斯哥兩大學。

其次,七人所述範圍,包括中小學、大學、海軍學堂、女子學校、職業學校、師範學校、教育行政制度及學制,其中以中小學及大學居多;又以郭嵩燾所見最廣且較全面。而從郭、張、宋三人所述,可略識當時英格蘭的三級學制架構。惟當時中國的官方儒學按程度只分為大學、小學兩級,故當使臣遇到英制中學時,理解及指涉上就有欠精確,以致用詞上出現大書院、書院、學堂、大學館、經館稱之,或雜以音譯校名。

二、如何認識

關於七人的英文能力及對英的認識,郭嵩燾不識英文,但因曾署理廣東巡撫、任福建按察使處理過洋務,被上視為洋務精透而使英;他曾讀魏源《海國圖志》(鍾叔河,2008a,頁19-21),該書50-51卷轉錄了英國各級學校狀況(魏源,2011)。郭、劉因不識英文,參訪時需翻譯解釋。張德彝出身同文館,為英文翻譯,且曾隨斌椿訪英。同治七年(1868年),張德彝又隨前美駐華公使蒲安臣出訪美、英等10國,任通事;回國後撰《再述奇》(又名《歐美環遊記》)(張德彝,2008a)。張德彝在英時,曾奉命往倫敦英人教習「艾德林」處肄業二個月(張德彝,2008a,頁708)。如比對劉、張二人書,可推斷劉應有參考張書。朱維錚(1998,頁14)認為,劉氏有剽竊抄襲張書之嫌。而曾紀澤懂英文,讀寫能力勝於聽說,使英時幾乎每日要讀,且行前曾讀過郭、劉之書。其餘人英

文能力不詳。

三、認識是否正確

出現的問題分為兩部分探討。

(一) 譯名問題

從七人日記中，常發現對同一人有不同音譯名，如郭嵩燾日記中的「三敦」及「山頓」是同一人；又有同一地或學校的譯名，因人而異，如牛津、劍橋兩校，譯名有多種（如表3）；即使同作者也會前後譯名不同，如郭氏。於是不僅當事人自己未必發現，後人如未親訪，因多採音譯，更不知所指為何校。

表3

牛津劍橋譯名比較

姓名	牛津譯名	劍橋譯名
郭嵩燾	阿斯福、阿斯甫、阿思甫、阿斯弗、阿思弗	刊比里治、堪百里治、刊百里治、鏗百里治
劉錫鴻	岳斯笏	刊卜吏治
張德彝	敖克斯佛	堪卜立址
曾紀澤	倭格師福爾德	—
薛福成	岳斯笏、阿克司福	千白雷池

(二) 英國教育見聞考證

以上七人見聞的英國教育是否周全？首先，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教育制度與蘇格蘭不同，後者近歐陸，多人曾訪問過蘇地學校，但均未敘明此點，或許不知兩者有差別。

其次，就中小學教育言，此時期正值英國通過多項教育法進行改革時刻。英國在十九世紀前，教育事務主要是由民間宗教性自願團體或私人機構自行負責，後期國家才開始逐步介入中小學教育（周愚文，2008，頁24）。

小學方面，十九世紀時主要由非國教派（Non-conformist）的「大英及海外學校社」（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及聖公會（Anglican Church）的「全國教育社」（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throughout England and Wales) 兩自願團體 (voluntary bodies) 辦學校 (含師資訓練學校)。1870年國會通過《小學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其要點有：建立學區 (school districts)，但非教區，區內成立「學校董事會」，可設公立學校，以補該區學校的不足。「董事會學校」(board schools) 需收學費，每週不低於9便士，但家長貧窮無力支付者，可減免部分或全部學費；5-13歲的兒童各區可決定是否強迫入學 (周愚文，2008，頁70-72，88-89)。1876年《小學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通過後，才逐步實施間接強迫 (周愚文，2008，頁70-72，338)，1880年始直接強迫。於是英初等學校分為國家及自願團體所辦二元體制。準此，郭、劉、張三人當時所見學校，是初具強迫性質。因當時中國並無義務教育的觀念，以致其在理解自願團體所辦初等學校時，借用了中國「義塾」的觀念，但兩者性質並不同。

中學方面，當時其對象是上層子弟，主要有屬「捐款學校」(the endowed schools) 性質的「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s) 及「公學」(public schools) 兩類。前者始於十四世紀，原為慈善性質，以古典課程為主，但十九世紀逐漸改變，由慈善、免費、招收貧窮子弟等性質，轉變為慈善與收費的混合制度；非古典課程開始進入學校 (周愚文，2008，頁116-117，128，130)；「公學」是由中世紀教會學校發展而來，原亦是服務窮人的公共學校，但漸變成服務上層的私人學校 (周愚文，2008，頁176)。1869年《捐款學校法》(Endowed Schools Act)，讓運用慈善基金成立的中小學有管理的法源 (周愚文，2008，頁144)。因慈善基金所設學校，所收學生常涵蓋各年齡層，橫跨中小學階段是「全齡學校」(all ages schools) (周愚文，2008，頁133)，多人所參觀的hospital schools 即屬之。

原本中小學並不銜接，1868年國會的《陶頓報告》(Taunton Report) 針對782所「捐款學校」調查後，首先承認「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教育階梯」(educational ladder) 政策，透過中等教育將小學與大學銜接，並希望針對不同階級需求，提供三種不同類型的學校 (周愚文，2008，頁140)。就整體學制言，英國現代學制形成於十九世紀末。之前是雙軌制，上層子弟先讀預備學校，後進「公學」或「文法學校」，再升入大學。至於中下階級

子弟，多是就讀教會或慈善團體所辦初等學校，再爭取中等教育機會。

因中國的官方儒學按程度只分大學、小學兩級，並無西方中學一級，以致諸人在理解時出現混淆。其多將小學譯為義塾，而將中學譯為大學館，但遇到西方大學時就出現用詞困難，或用大書院（或指圖書館）、太學、書院等詞，或直接音譯，college譯為「科里治」，university譯為「由尼法西諦」。此法對無西方經驗者言，恐無法理解譯名之意。又宋育仁（1964，頁15）用中國小學與大學概念去理解西制，以致將英國中學視為經館，納入小學之下，顯有矛盾；大學內，又將大學本部與學院分為太學與書院，更易生誤解。

復次，大學方面，英格蘭以牛津及劍橋兩校最老，其下各自擁有多個學院。諸人多知牛津、劍橋，但對十九世紀新設倫敦及「達蘭」（Durham）兩大學卻認識不多。有人曾訪利物浦、伯明罕、里茲、曼徹斯特等大城，但未注意新設的省級學院；招收對象由上階級子弟，逐漸擴及中產階級及優秀勞工階級子弟；學生就學從寄宿制轉為寄宿制與通勤制並行（周愚文，2008，頁290-291）。

再者，對於牛津、劍橋校內，大學與所屬各學院間關係的認識不明。因在英大學本部是行政中心，負責考試及學位授予，而學生歸屬各學院，課程、教學、住宿及生活管理，均由學院負責。此點只有郭、宋二人有較仔細的說明，但仍不能完全理解兩者間關係及院自主程度。郭氏誤以為兩者平行，故計算牛津所屬學院數時，將大學本部納入而算成21學館。且他在記述牛津學位考試時，理解可能有誤。按牛津當時學士與碩士考試有人文等四科目，成績分普通及優等（honors），優等又分一、二等（周愚文，2008，頁208）。他將三級學位類比為中國科舉的秀才、舉人與翰林。而說三試章程，略仿中國試法為之，屬中國三代學校遺制（郭嵩燾，2008，頁379）。至於所稱「得來波斯」（tripos）一制，是實行於劍橋大學的學位考試，分三級（Wrangler, Senior Optimes, Junior Optimes），類似牛津的優等（周愚文，2008，頁222）。他明顯將兩校制度弄混。儘管如此，他應是清朝最早介紹牛津大學全貌者。又張德彝（2008b，頁546）謂文武大小官員必由牛津劍橋出身，但實不必然，如名將「威靈頓公爵」（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僅畢業於「伊頓公學」（Eton College）。關於大學學位考試與授予，宋育仁（1964，頁15）前述經太學考試給以文憑後再入太學深造，顯然誤以為是入學考試而非畢業考試；又學生

22 教育研究集刊 第62輯第3期

出於太學各歸其社會，同社相互切磋至學業名望大成卓著者，復與文憑秩進如進士，又誤解博士學位的授予方式。

至於蘇格蘭，郭嵩燾（2008，頁762）所記該地四所大學創校時間均與今各校官方說法不同，如表4。

表4

蘇格蘭大學創校時間比較

大學	郭嵩燾	各校官方說法
聖安德魯	1412	1413
格拉斯哥	1443	1451
亞伯丁	1494	1495
愛丁堡	1582	1583

再次，就教育行政制度言，因英未像德、法及早推動國家義務教育，故未設中央教育行政單位，直至1833年國會補助學校興建校舍，國家始介入教育事務。1839年成立「樞密院教育小組」（the Committee of Privy Council on Education）負責。1856年在小組下成立「教育署」（Education Department），由教育小組主席任首長，另設副主席（周愚文，2008，頁74-75）。至於地方，則自1870年起始設「學校董事會」，負責管理學區內的「董事會學校」（周愚文，2008，頁335）。

七人中郭嵩燾注意到並略述其事。他將「教育署」譯為學部，並訪問過副主席山頓，他稱為尚書，獲贈法規及年報。但他並不知此時該單位的職權有限，位階不高，並不等於日後的教育部。再者，該署只管理公立小學，國會另有「慈善委員會」（Charity Council）負責管理英、威兩地的「捐款學校」（周愚文，2008，頁309）。而郭、劉、張三人所參觀的hospital schools，即屬該類，是由「慈善委員會」管轄。宋育仁亦略述之。

最後，劉氏注意到不同社會階級，受教機構與方式都不同，但不知此即是雙軌制；且義塾非初教機構的全部，尚有公立的「董事會學校」。

肆、影響探討

一、見聞紀錄的流通

以上七人出使後都有相關紀錄出版，甲午前多已流通，以下依序說明。

首先，郭嵩燾《使西紀程》是呈給總理衙門（總署）出使英國途中及初到倫敦（10-12月）的報告。光緒三年由同文館出版。如李鴻章（1823-1901）3月〈復郭筠僊星使〉信中，提到：「總署鈔寄行海日記一本，循覽再四，議論事實，多未經人道者」（李鴻章，1987，頁207）。可見李氏看過該書。但因劉錫鴻編造日記、匿名誣告郭氏及湖北翰林何金壽參奏郭，掀起大波瀾（郭嵩燾，2008，頁280，298，322），最後郭被迫毀收書版。李鴻章10月初〈復郭筠僊星使〉信中說：「執事日記一編，初聞蘭孫（李鴻藻）大為不平，逢人詆毀。何君乃逢迎李景，發言盈庭。總署懼而毀板，謗者遂亦終止。何疏未見底稿，究不知其詳」（李鴻章，1987，頁241-242）。不過該書仍有人看過。如光緒三年4月下旬鄉友王闓運（1833-1906）日記載：「樾岑來談，筠仙（按郭嵩燾）海外日記，無異斌椿也」。又記：「松生送筠仙日記至，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王闓運，1964，頁178）。又6-8月的《萬國公報》連載該書內容，被禁後仍續刊（貝奈特，2014，頁160）。曾紀澤使英途中，光緒四年8月初看其《使西紀程》（曾紀澤，2008，頁103），11月初再看（曾紀澤，2008，頁139）。後郭氏光緒十五年（1889）〈致李鴻章〉信說，友人告知薛福成曾以《使西紀程》入告，蒙聖上垂詢，知薛氏讀過該書（郭嵩燾，2012a，頁460）。惟該書所記內容，主要是港、星的狀況。光緒十七年（1891年）6月郭氏病逝後，李鴻章（1967，頁3）奏〈臚陳事實疏〉，陳述郭氏學行政績，懇請恩宣付史館立傳，並請賜謚。但朝廷仍覆不准立傳賜謚，理由是：「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資物議」（引自汪榮祖，1993，頁401-402）。前書雖被毀版，郭仍繼續寫日記，但不再呈報總署（郭嵩燾，2012a，頁460），也密不示人。出使日記要到身後才得出版，以致後人無法及早得知英國的教育狀況。

劉錫鴻的《英軺私記》，因與郭氏互告被限制流通。郭友人曾信告，「曾從

李壬叔（善蘭）處藉觀廣東生（即劉錫鴻）《英軺日記》，逾日乃復索回，云「總署相戒不外傳也」（郭嵩燾，2008，頁786）。但曾紀澤（2008，頁70）出使前，光緒四年3月看過該書。而薛氏當看過。

張德彝的《四述奇》（後名《隨使英俄記》）光緒七年（1881）撰成，光緒九年（1883年）有常瑞、英煦作序，故當時應有刻本刊印（張德彝，2008b，頁269-272）。曾紀澤（2008，頁911）歸國前，光緒十二年（1886年）2月始看該書。

曾紀澤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病逝後，光緒十九年（1893年）江南製造局出版《曾惠敏公使西日記》（曾紀澤，1975a），惟該書是節本。但早在光緒五年4月郭嵩燾友人曾示曾氏日記一本（郭嵩燾，2008，頁1009-1010），當是抄本。

此外，王錫祺於光緒十七年出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其中收錄《使西紀程》、《英軺私記》、《隨使日記》、《使英雜記》、鄒代鈞《使西紀程》、曾氏《出使英法日記》（節本）（王錫祺，1962）。光緒二十年（1894年）出補編，光緒二十三年（1899年）出再補編，收錄《使西日記》（節本）及《泰西各國采風記》（王錫祺，1964）。

二、制度的引介

（一）郭嵩燾的努力

在七人中，郭嵩燾特重西學及英國教育，首先，在英期間就數度致函洋務重臣李鴻章及沈葆楨（1820-1879）引介英國的教育。如光緒三年2月〈致李鴻章〉第三信言，見英快速進步，再見日在英學習技藝200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90人中所見20餘人，皆會英語；並說前諸侯長岡良芝助及前戶部尚書恩婁葉歐摩都在英學習，謀盡仿效施行，但學兵法者甚少。他遂建議，令李鳳苞（1834-1887）攜出洋船政學堂官學生，改習相度、煤鐵及鍊冶諸法及興修鐵路及電學，以求實用；並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津、滬、閩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曉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材質所近分途研習。各機器局亦當添設教師二、三人，以待來者（郭嵩燾，2012a，頁273）。但李相6月初〈復郭筠僊星使〉信中說：西洋政教規模，他雖未致到地，但留心咨訪考

究幾20年，亦略聞梗概。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海防議起，他數陳各海口必應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但時相文祥卻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但王孝鳳、于蓮舫痛詆之。信尾說：「李丹崖（鳳苞）帶學生至英、法，弟與閩、江各帥會奏定案，專指學習製造、駕駛，似未便遽改別圖」（李鴻章，1989，頁215-217）。可知李氏曾想建西學，但朝廷不許，並婉轉回絕郭氏建議。

光緒三年5月郭氏寫信給李相，7月李相〈覆郭星使〉信中說，郭論博物館、學館、炫奇會，誠為盛舉，但是：

西人志在牟利，以炫奇為主。中國志在考鏡，以博物館、學館為主。借用洋款，恐為廷議所持。由洋人建造，亦有倒持太阿之慮。若中國故覓洋工自行建造，則將來招致學生，研究西學，歲費既須議定，經理尤需得人。……。借用洋款，計息輕重，各視臨時經手者之定議，亦難據此一次照減。（李鴻章，2008，頁103）

因郭原信內容不詳，從李回信推測，郭建議於國內設博物院、學館、辦展覽會，經費則擬借洋款，但李未應允。

光緒四年2月他致李相信中提到：

福建船廠官學生最為沉潛向學，可望有成，由沈幼丹（葆楨）收召世家子弟，納之官廠。又於其間擇其才品佳者出洋就學，資以厚糈，其年皆始及冠……然欲其有裨益國家，則恐不能，何也？中國學館、營制規模制度全未之講，彼數十人者，學幸有成，不能遽授以官、任以事也。又無學館足以處之，使傳授所學，極其量不過挾所藝自矜獨得之奇，以罔利而已。……。

他認為：

中國之要務，莫急於整理學校，不能遽仿西洋之崇尚實學，而人心風俗

之源必基於此。其課之等差，與其董戒之大義，必應講求之，亦非甚高遠難行，必待賢且能者而後能為之者也。學校既修，始可甄別人才，分門立課，相助講習，而導使世家子弟出洋受學。學成而還，則以所藝互相講授……。（郭嵩燾，2012a，頁316-317）

又光緒四年11月致沈葆楨函表示，人才及國勢關係本原大計，莫急於學。而自秦漢以來，學校不修，二千餘年流極敗壞，以至今日。他至泰西而見三代之制有一、二存者，大抵規模整肅，討論精詳，皆尚實用，不為虛文。遂建議沈氏：

宜先就通商口岸開設學館，求為徵實致用之學。略舉其義：一曰分堂以立為學之程，二曰計時以示用功之準，三曰明訂規則以使有依循，四曰分別去留以使知勸戒。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達縣鄉，期以廣益學校之制，……。（郭嵩燾，2012a，頁351）

其議恐未獲採行，而沈氏於隔年病逝。

光緒四年底郭氏離任前抄開設學館及舉薦出洋人才兩咨稿送閱（郭嵩燾，2012b，頁705）。光緒五年正月初離英前，他分咨總理衙門〈咨開立西學四堂〉及南北洋大臣〈咨立西學四堂大致章程〉（郭嵩燾，2008，頁885）。可見其對西學堂的重視及試圖遊說重臣，但內容尚未查得。

其次，離任返國後，他持續關心國內辦理西式教育的狀況。2月初他在返國同船的江南製造局翻譯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告知，上海廣方言館一切皆為具文。曾設英、法文各一局，現存不過數人。而課幼童20人，大致如蒙館。又設礦學、機器、駕駛各一局，皆洋人主之，但不通漢語，就學者又皆不通洋語，雖設通事，但只支薪而不問功課。郭氏慨嘆：「凡事創始難，創始而即為具文尤難整頓」（郭嵩燾，2008，頁922-923）。3月記，與友李勉林、劉芝田（後任英公使，1827-1892）「粗論西學館事宜，當稍議章程，由李鴻章定奪。……西洋政教、製造，無一不出於學。中國收召虛浮不根之子弟，習為詩文無實之言，……而學校遂至不堪聞問。稍使知有實學，以挽回一世之人心，允為當今之急務矣」（郭嵩燾，2008，頁973）。由此可知，他初歸國有心改革學校。返

滬後曾訪三所西學堂。3月中，隨李勉林、徐雪村（徐壽，1818-1884）訪廣方言館。記曰：「凡習中國文字三堂、習英法文字三堂。中學教習三人，西文教習三人。外西學三堂，一畫圖兼輪船機械、數學兼演炮、一製造船務，皆洋人主之，大致皆用西法，但無功課去留之准，月給薪水養膳而已」（郭嵩燾，2008，頁978）。之後訪格致書院，與美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會談。再同訪徐家匯天主堂，並記其旁設學館，肄業生160餘人，並習中國文書。有博物館，學館分三所，一女學館；一課習外國學館，以拉丁文字為主，兼及數學、化學，不過數十人（郭嵩燾，2008，頁980）。4月中，徐雪村擬呈所擬格致書院章程六條。另送《格致書院要錄》一書，亦有章程六條（郭嵩燾，2008，頁1006）。

當他決意引退後，遂返湘興學。光緒五年6月舊屬張力臣告知，湖南學政朱迥然（1836-1882）擬恢復附於省城嶽麓書院的湘水校經堂，經費取鹽務三錢餘款，每年可得九千金。將分建經史文藝等四堂，每堂設一學長司訓課，而以一總教習主之，以季課考其勤惰，而司其進退之權。力臣代擬咨院一稿，而郭嵩燾為之酌定章程，因該議本發自郭，故尤樂見其成（郭嵩燾，2012c，頁142）。郭氏認為創建堂館及延聘通儒，絕非易事。須異於今日辦書院學館之法，為此他重新檢視之前嚴復所示的英、法兩國學館課程，摘取其大要，但覺已如浩如煙海，讓國人視之，茫然不知其涯（郭嵩燾，2012c，頁150）。由此可知，連有實際經歷的他都不易採西學大要，更遑論無經驗者。而所謂「藝」，王興國（1998，頁169，551，556）謂應是自然科學，因籌設過程中，他收到匿名書〈偽校經堂奇聞〉攻擊該校「不講時文試貼，而講天文算學，其計狡毒」，視其為內奸欲除之。此反映出他企圖改革傳統書院重視科舉以考課為主、試藝時文的作法。他未盡廢傳統學術，僅增西方實學就遭到匿名攻詰，由此反應湘地仇洋反西學的氛圍。

因朱迥然擬以鹽務餘款修復校經堂事，受阻於經費，數月不能定議。光緒五年7月郭嵩燾便欲「別立書院，講求徵實致用之學」（郭嵩燾，2012c，頁161）。後該堂雖辦，但11月他認為朱氏設校經堂，用意只在安置一、二位相賞識者（郭嵩燾，2012c，頁201）。光緒七年他另在長沙創辦思賢講舍，以弘揚王船山之學為宗旨，正月議定思賢講舍學規10條（郭嵩燾，2012c，頁344）。2

月議定設講舍監院一人，又設算學、製造一人，為殷竹塢（郭嵩燾，2012c，頁352）。3月開館，諸生至15人（郭嵩燾，2012c，頁365）。陸寶千（2005，頁305-306）以為是私人設科學課程最早者。由此可知，他企圖在中學架構下，引入西方實學。不過藉中學以正人心風俗，仍是該講舍的重點，如光緒九年2月記曰：「乾隆以後，各縣皆立書院，學校為最盛。而一以利誘之，於學問源流本末，全失所以為教，直使敗壞人心風俗，有損無益。所以創立校經堂、思賢講舍，求一挽學校之陋」（郭嵩燾，2012c，頁557）。又再查其光緒七至十七年日記，已絕少提及西學，故至他過世前，仍以治中學為主。

（二）其他人的情形

曾紀澤於光緒十二年卸任返國後，總稅務司驚賓赫（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擇泰西新出學塾有用之書16種，囑英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譯成華文書，⁶曾於〈西學略述序〉說：

泰西之學，條別派分更僕難數，學成而精至者，……，其授學伊始，往往舉孩提之童所能言能知、匹夫匹婦所不屑者，筆之為塾鈔，編之為日課，耆彥師姆諄復道之，不以粗淺為恥，翻以躡進為戒，其向學易，而為學以次第，此泰西學者之所以眾多，而成名者亦因是而濟濟焉。（曾紀澤，1975b，頁403）

他又說使歐時，每欲纂集見聞，編為一帙，但因事務紛陳，因循不果。今閱此16種，實獲其心。雖是發蒙之書，淺近易知，但所謂深遠者，未能出於此書範圍外。故有意西學者，可以《爾雅》、《急就章》視此書（曾紀澤，1975b，頁404-406）。光緒十五年3月初，曾氏奉派同管同文館，於〈派管同文館事務謝恩疏〉中說朝廷：「交涉既繁，同文館遂成要務，鑽研不息，肄業生自有英才。慮學徒日久懈生，是用早整頓」。故表示「唯有隨事稽查，多方誘掖，督率漢洋之教習，酌參前後之章程，策愚柔以進明強」（曾紀澤，1975b，頁341-342）。但8月初上命兼署吏部左侍郎（曾紀澤，1975b，頁343）。當時英教士李提摩太

⁶ 書名《西學略述》，1886年總稅務司署出版。

(Richard Timothy, 1845-1919)曾提出中國現代教育改革方案，曾氏對此充滿熱情並力促他在高官中散播，但因自己在總理衙門處次要地位且前同情外人已被懷疑，故不敢積極倡導實施該方案（蘇慧廉，2007，頁152-153）。隔年2月就不幸病逝（潘德利、王宇，2011，頁274）。

劉錫鴻雖著《英軺私記》，所述西洋文明，貌似閱博，但郭氏認為只是耳食翻譯馬格里所說。基本心態仍是「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汪榮祖，1993，頁285）。因劉、郭交惡，光緒三年9月另派駐德公使。光緒四年7月被召回，由李鳳苞接任（汪榮祖，1993，頁291）。回國後返京任官，光緒七年上疏彈劾李鴻章被革職（鍾叔河，2008b，頁27）。而張德彝於光緒四年11月改調俄館至6年4月。後再使英、德、日等國。薛福成於光緒二十年任滿返國不久即病逝。故劉、張、薛三人當無機會推介。

甲午後宋育仁歸國，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返川辦《渝報》，主要內容之一是改革科舉制度，培養新學人才。次年任尊經書院山長，格致類納入古今中外語言文學、天文地生、化重光聲、電氣力、水火氣、地質、動植物、算醫、測量、牧畜、機器製造、營建、礦學。在他倡導下，蜀地創辦多所新式學堂。又編印《蜀學叢書》介紹西學。戊戌政變時險遭株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任江南南菁學堂教習、監督（黃宗凱、劉菊素、孫山、羅易，2007，頁8-12）。至於鄒氏尚查無有關紀錄。

由上所述可知，以郭、曾、宋曾試圖引介。

伍、結論

清光緒朝始派員使英，甲午前有七人曾參訪過英國學校，並留下教育見聞紀錄，此種介紹外國教育之法類似比較教育學上「旅人故事時期」作法。本文針對其紀錄進行分析後發現，所參訪及介紹的學校涵蓋中小學、大學、海軍學堂、女子學校、職業學校及師範學校；地區以英格蘭為主，兼及他地；另提及教育行政制度及學制。其中，張德彝及曾紀澤通曉英語，其餘人參訪時，需透過翻譯，故溝通時難免有隔閡，以致出現同校譯名卻不一現象。七人中屬郭嵩燾最關心西學與教育，在參訪學校數、地區及類型上，都較他人多且廣，但對英國教育的認識

仍無法周全。

他們當時所見的英國教育正處變革中。英國從十九世紀起國家開始逐步介入中小學教育，但因教會力量龐大而形成國家與自願團體二元辦學體制。除原有牛津、劍橋兩校外，也陸續新設倫敦、達蘭等大學及省級學院。制度上，漸形成大、中、小學銜接的三級學制。另教育行政制度初建，且偏地方分權，中央設有「教育署」及「慈善委員會」，地方則有「學校董事會」。對象上，中小學與大學，從招收上層子弟，漸擴及中產階級及勞工子弟。七人中雖郭、宋二人所見較廣，但對複雜的英國制度及變化，仍無法一窺全豹，其餘多是盲人摸象；且許多情況因中國所無，以致其用原有觀念理解所見時，難免失當；如中國的官方儒學按程度分只有大學及小學，而無中學，當遇到英國各類中學時，大學館、經館等用詞並不貼切；另對於宗教性自願團體所辦小學或慈善家捐款所辦學校，只能用義塾觀念去理解，或直接音譯校名。又不知英國社會階級對教育的影響程度，以及英格蘭與蘇格蘭制度不同等。故諸人見聞只是對當時英國教育最粗略的認識。

七人的紀錄於甲午前多已出版，數位後使英者曾看過。但在當時朝野反洋的大氛圍下，諸人及其書受重視程度當有限。其中以郭嵩燾最積極引介。在英時，即數度致函洋務重臣李鴻章及沈葆楨，遊說其仿行西法但未獲採納。當他返國之初，還主動關心推動西式教育，曾參訪上海廣方言館、格致書院及徐家匯教會學校。致仕返湘後，先後參與恢復校經堂及創辦思賢講舍，欲仿英法之法，改進傳統書院教育，新設有關西學的考課及教習。曾紀澤後雖出掌京師同文館，但數月後即改兼他職，不久便病逝。而宋育仁企圖在尊經書院及南菁學堂引入西學，其他四人則未見引介行動。

以上晚清引介英國教育的歷程，如用比較教育學者（Philips, 2004, pp. 55-59）「教育轉移」（educational transfer）理論中所述「教育借入」（educational borrowing）方式來理解，他所謂「教育借入」是指有目的的模仿及借鑑被觀察國的政策與實際，以及透過教育理念與方法普遍引入的影響。只不過由上所述可知，雖然當時已有少數外交人員開始主動介紹英國教育的見聞，但是限於當時社會反洋的氛圍濃厚，諸人的見聞並無法廣為宣揚，更遑論引入實施，故此段時期只能視為「教育借入」前的醞釀階段而已。儘管對外人的稱呼，已由夷改洋，但中外衝突不斷，以致朝野立場是反洋仇外，郭嵩燾甚至被鄉人毀謗，視為內奸，

被朝中清流黨挾怨糾彈，故其在英國的一手教育見聞，實難以引介到國內，更無法像日派大批官民到英學習，歸國後受重用，協助推動明治維新。甲午一戰，兩國強弱立判，清廷一再錯失改革時機，由此可知。而郭氏推動洋務的挫敗，汪榮祖（1993，頁403-411）則以「走向世界的挫折」喻之。

DOI: 10.3966/102887082016096203001

參考文獻

王興國（1998）。郭嵩燾評傳。南京市：南京大學。

[Wang, X.-G. (1998). *Sung-T'ao Kuo: A critical biography*. Nanjing,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王錫祺（編）（1962）。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市：廣文。

[Wang, S.-C. (Ed.). (1962). *A collection of geographic literature of small square pot hall*. Taipei, Taiwan: Kuang-wen.]

王錫祺（編）（1964）。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再補編。臺北市：廣文。

[Wang, S.-C. (Ed.). (1964). *A collection of geographic literature of small square pot hall supplement II & III*. Taipei, Taiwan: Kuang-wen.]

王闈運（1964）。湘綺樓日記（一）。臺北市：學生書局。

[Wang, K.-Y. (1964). *Hsiang-ch'i building diary (I)*.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朱維錚（1998）。導言。載於錢鍾書（主編），郭嵩燾使西記六種（頁1-34）。北京市：三聯。

[Zhu, W.-Z. (1998). Introduction. In C.-S. Ch'ien (Ed.), *Kuo Sung-t'ao's diplomatic diary and others* (pp. 1-34). Beijing, China: SDX Joint.]

宋育仁（1964）。泰西各國采風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再補編，第11冊）。臺北市：廣文。

[Sung, Y.-J. (1964). *Traveling records of the west* (A collection of geographic literature of small square pot hall supplement II & III, Vol. 11). Taipei, Taiwan: Kuang-wen.]

李鴻章（1967）。合肥李鴻章臚陳事實疏。載於郭嵩燾（主編），玉池老人自敘（頁1-26）。新北市：文海。

[Li, H.-C. (1967). Hefei Li Hung-Chang report. In S.-T. Kuo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Yu-ch'ih old person* (pp. 1-26). New Taipei, Taiwan: Wen-hai.]

李鴻章（1987）。李文忠公選集。臺北市：大通。

[Li, H.-C. (1987). *A collected works of Li Hung-Chang*. Taipei, Taiwan: Tatung.]

李鴻章（2008）。覆郭星使。載於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頁103）。合肥市：安徽教育。

[Li, H.-C. (2008). To envoy S.-T. Kuo. In T.-L. Gu & Y.-L. Ye (Eds.), *A complete works of Li Hung-Chang: Letters* (p. 103). Hefei, China: Anhwi Education.]

汪榮祖（1993）。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市：東大。

[Wong, Y.-T. (1993). *A frustration from east to west: Kuo Sung-t'ao and his times*. Taipei, Taiwan: Tung-ta.]

周愚文（2008）。英國教育史近代篇（1780-1944）。臺北市：學富。

[Chou, Y.-W. (2008). *A history of modern education in England (1780-1944)*. Taipei, Taiwan: hsui-Fu.]

宜坵（1962）。初使泰西記。載於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頁8755-8840）。臺北市：廣文。

[Yi, K. (1962). A record of first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west. In S.-C. Wang (Ed.), *A collection of geographic literature of small square pot hall* (pp. 8755-8840). Taipei, Taiwan: Kuang-wen.]

貝奈特（2014）。傳教士新聞工作者在中國：林樂知和他的雜誌（1860-188）。桂林市：廣西師大。

[Bennett, A. A. (2014).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Gueilin, Chin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徐宗林、周愚文（1997）。教育史。臺北市：五南。

[Hsu, T.-L., & Chou, Y.-W. (1997). *History of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Wu-Nan Book.]

張德彝（1962）。使英雜記。載於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頁9137-9244）。臺北市：廣文。

[Chang, T.-Y. (1962). Notes as diplomat in Britain. In S.-C Wang (Ed.), *A collection of geographic literature of small square pot hall* (pp. 9137-9244). Taipei, Taiwan: Kuang-wen.]

張德彝（2008a）。航海述奇·歐美環遊記。長沙市：岳麓書社。

[Chang, T.-Y. (2008a). *Stories of voyage: Travelling records around Europe and America*.

Ch'angsha, China: Yuelu.]

張德彝（2008b）。《隨使英俄記》。長沙市：岳麓書社。

[Chang, T.-Y. (2008b). *Records as diplomat in Britain and Russia*. Ch'angsha, China: Yuelu.]

郭嵩燾（2008）。《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市：岳麓書社。

[Kuo, S.-T. (2008). *Diary in London and Paris*. Ch'angsha, China: Yuelu.]

郭嵩燾（2012a）。《郭嵩燾全集·集部》。長沙市：岳麓書社。

[Kuo, S.-T. (2012a). *A complete works of Sung-t'ao Kuo (Literature)*. Ch'angsha, China: Yuelu.]

郭嵩燾（2012b）。《郭嵩燾全集·史部四》。長沙市：岳麓書社。

[Kuo, S.-T. (2012b). *A complete works of Sung-t'ao Kuo (History IV)*. Ch'angsha, China: Yuelu.]

郭嵩燾（2012c）。《郭嵩燾全集·史部五》。長沙市：岳麓書社。

[Kuo, S.-T. (2012c). *A complete works of Sung-t'ao Kuo (History V)*. Ch'angsha, China: Yuelu.]

陸寶千（2005）。《郭嵩燾先生年譜補正及補疑》。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Lu, P.-C. (2005).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Kuo Sung-t'ao: Correction and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斌椿（2008）。《乘槎筆記》。長沙市：岳麓書社。

[Bing, C. (2008). *Travelling notes by ship*. Ch'angsha, China: Yuelu.]

曾紀澤（1975a）。《曾惠敏公（紀澤）使西日記》。新北市：文海。

[Tseng, C.-T. (1975a). *A diplomatic diary of Tseng Hui-min Kung to the west*. New Taipei, Taiwan: Wen-hai.]

曾紀澤（1975b）。《曾惠敏公（紀澤）奏疏》。新北市：文海。

[Tseng, C.-T. (1975b). *Reports of Tseng Hui-min Kung*. New Taipei, Taiwan: Wen-hai.]

曾紀澤（1975c）。《曾惠敏公（紀澤）文集》。新北市：文海。

[Tseng, C.-T. (1975c). *A collected works of Tseng Hui-min Kung*. New Taipei, Taiwan: Wen-hai.]

曾紀澤（2008）。《出使英法俄國日記》。長沙市：岳麓書社。

[Tseng, C.-T. (2008). *A diplomatic diary in Britain, France and Russia*. Ch'angsha, China: Yuelu.]

黃宗凱、劉菊素、孫山、羅易（2007）。《宋育仁思想評傳》。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學。

[Huang, T.-K., Liu, J.-X., Sung, S., & Lo, Y. (2007). *A thought and critical biography of Yu-jen Sung*. Chengdu, China: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楊國賜（1975）。《比較教育方法論》。臺北市：正中。

[Yang, K.-T. (1975).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Cheng-chung.]

鄒代鈞（1962）。《西征紀程》。載於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頁9507-9608）。

臺北市：廣文。

[Tzou, T.-C. (1962). A diplomatic record to the west. In S.-C. Wang (Ed.), *A collection of geographic literature of small square pot hall* (pp. 9507-9608). Taipei, Taiwan: Kuang-wen.]

劉錫鴻（2008）。*英軺私記*。長沙市：岳麓書社。

[Liu, S.-H. (2008). *A personal record in Britain*. Ch'angsha, China: Yuelu.]

潘德利、王宇（2011）。*曾紀澤年譜*。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

[Pan, D.-L., & Wang, Y. (2011).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Chi-tse Tseng*. Beijing, China: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黎庶昌（2008）。*西洋雜誌*。長沙市：岳麓書社。

[Li, S.-C. (2008). *A notes of the west*. Ch'angsha, China: Yuelu.]

薛福成（2008）。*出使日記續刻*。長沙市：岳麓書社。

[Hsüeh, F.-C. (2008). *A diary of envoy supplement*. Ch'angsha, China: Yuelu.]

鍾叔河（2008a）。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載於鍾叔河（編），*倫敦與巴黎日記*（頁5-65）。長沙市：岳麓書社。

[Chung, S.-H. (2008a). A diary of Sung-t'ao Kuo in London and Paris. In S.-H. Chung (Ed.), *A diary in London and Paris* (pp. 5-65). Ch'angsha, China: Yuelu.]

鍾叔河（2008b）。用夏變夷的一次失敗。載於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VII*（頁11-37）。長沙市：岳麓書社。

[Chung, S.-H. (2008b). A failure of transferring from foreigners to Chinese. In S.-H. Chung (Ed.), *From east to west: Chinese travelers before 1911 VII* (pp. 11-37). Ch'angsha, China: Yuelu.]

魏源（2011）。*海國圖志*。長沙市：岳麓書社。

[Wei, Y. (2011). *Records and maps of foreign countries*. Ch'angsha, China: Yuelu.]

蘇慧廉（2007）。*李提摩太在中國*。桂林市：廣西師大。

[Soothill, W. E. (2007).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Gueilin, Chin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hilips, D. (2004). Toward a theory of policy attraction in education. In G. Steiner-Khamsi (Ed.), *The global politics of educational borrowing and lending* (pp. 54-68).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